

任志强：从慈善到公益的“修行”之路

■ 本报记者 文梅

由于多年来任志强一直担任北京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，且对中国地产素以言论“大胆”著称，故而大多时候，媒体想要跟他聊的都会是关于房价涨跌的事，即使他在2014年11月正式宣布退休之后。

但是，很多人忘记了，任志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：公益人。任志强和公益结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，不过他将自己和华远公司早年间的公益捐赠经历定义为“慈善”，他认为从慈善到公益最好的发展形态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活动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。

从华远地产一把手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，任志强目前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职务，与公益有关的有两个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、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长。

7月18日，差不多已经沉寂了一年之久的任志强，在华远地产企业号的办公室里，接受了《公益时报》的独家专访。访问的话题只有一个：公益。

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一次，任志强坦露自己从慈善到公益的修行路，这条路他已经走了30多年。当记者问及，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公益之路时，他的回答并不轻松，认为“只是开了个头，未来还很艰难，还要经过很长一段路才行”。

现在，让我们一起听听任志强怎么说。

从慈善到公益的四步认知

我对“公益”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经过早期大量“慈善”活动的学习积累，最终才走上了真正的公益之路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，我开始接触“慈善”。那时人们对于“慈善”的概念就是“学雷锋做好事”。

华远公司出钱配合做了一些大龄青年的联欢活动、音乐交流和春节期间的展销会，还有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新生募捐做人工下巴。

自1988年，我们开始支持中国桥牌运动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对该运动项目的定向公益扶持还在继续。事实上，华远对中国体育运动的支持跨越多种项目，还包括游泳、网球等。

90年代初期，我开始为中国改革基金会捐钱，为国内经济学家、专家学者从事的多项经济政策的研究提供赞助支持。

由茅于軾老师和吴敬琏老师发起的乐平公益基金也是我大力支持的，还关注了与此相关的保姆学校以及农村幼儿园等公益项目。

截至目前，华远现在每年资助的公益项目有19个。

2004年由原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发起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，至今已经走过13年历程，我是从始至今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虽然个中不乏困难挫折，但我们还是会坚持往前走。

2011年，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和我联合创办了金融博物馆书院，到现在已经运行了6年，如今我们的书友已经遍布国内多个城市，让读书教会人们学习独立思考、开启智慧，是我们创办这个书院的初衷。

通过这些年的亲身体会和经历，我个人总结“从慈善到公益”的认知过程应该包括四个方面：第一层级就是单纯的“给钱付出型”慈善；接着就是从本质上提升认识，即：“授人以鱼”不如“授人以渔”；到第三步就是给予受助方更大的发展空间，赋予其更多的权利；最后也是最好的发展形态就是通过社会公益活动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。

阿拉善模式贵在“民主治理”

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团体实际上是通过社会自愿的形式，实现了一套民主管理的方式。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是选举的，包括我们的理事、监事，还有章程委员会。会员是主人，他可以不断地提出意见来参与到其中，然后进行修改。

在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，你光拿钱说事就行不通。比如说刘晓光第一次组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时候，王石就问：“你要多少钱？一百万我给你，然后我也不来了。”刘晓光就坚决不同意。我们要求你分10年，一年捐10万会费，捐满了10年就可以不再捐钱了。我们希望你沉下心来参与，就是你要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去。

大家都知道马蔚华是壹基金的理事长，以前是招商银行的行长，在我们这竞选监事的时候把他选掉了。就是因为强调每一个会员的平等参与。

民主的制度对公益组织的发展意义重大。我们秘书处有个同志写了一本书叫做《为公益而共和》，厚厚的一本，里面记录的就是我们组织内部的人天天在为工作吵架，直到现在还在吵，我们的组织好像没有一天不吵架，但所有人吵架其实都是为了让它更好。

金融博物馆书院为“启蒙”而生

2011年7月，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推出第一期读书会，当时是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主持，阿拉善SEE创始人刘晓光和我担任嘉宾，现在一晃就过去6年了。

我们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书院，完全是免费提供的社会讨



任志强在“任小米”生产基地

论。通过一些企业家、经济学家、学者、外交家、小说家，把各种各样的知识普及给社会。读书会要通过学习让大家认识到，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，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，我们的社会需要如何去发展，它的本质是思想启蒙。

我们在读书会特别强调的是，并不是台上人给台下人一个标准答案，因为你成不了第二个马云，你也成不了第二个柳传志，但是你可能会超过马云和柳传志——就是你要有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去寻找市场的机会，然后去做一个努力奋斗的人，你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些条件使自己成功。更重要的是启蒙。

目前的互联网时代，知识信息的碎片化很普遍，我们主张大家系统性地去读书，这样不容易被碎片化的知识所欺骗。碎片式的知识就像鸡汤一样，每次给你选一句、两句的，如果你这个鸡汤是连续的长期的没问题，但是如果只有其中的一段或者断章取义的时候，那就很危险，很麻烦了。

“任小米”有“大市场”吗

“任小米”的种植是经过三年的反复试验后选择的一个节水品种。在当地30万亩土地中，我们只占了不到一万亩。

因为不是国家专储，所以就要和农民签合同，否则他就不种了。现在有十五六个合作社，还要教农民怎么选种子、怎么种，怎么样用以色列的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。

要想办法在最基层解决农民贫富的问题，让他们的收入高于用其他方式获取利益的收入，既解决了收入问题，也解决了环境保护问题，这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。

今年是“任小米”种植的第三年，我们还没有把市场的销售渠道和其他一些问题都解决掉，我们正在努力的建设这些内容。

比如说小米就只能熬粥吃吗？现在我们开始生产小米棒、小米饼，同时开始试生产蛋糕系列，把40%的小米做成蛋糕，采用不同的销售渠道。

社会企业是用盈利的方式，来帮助穷人、病人和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获得收益。社会企业要想健康发展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有良心的企业家。

目前在工商注册的社会企业并不享受免税政策，今年开始我们用农民合作社的方式在做，这样的话过程中就减少税收，如果法律上允许的话，就可能更好一点，那么这些东西就可能卖得更便宜一点，但现在不行，因为要这些成本。

所以，当一个企业家不去做赚钱的，而是去做可以赚钱，但有难度，并且赚了钱又不分配给自己，而是再次投入到公益当中去的“麻烦事”，那就需要有公益之心。如果没有这种公益之心在背后支撑的话，你是做不成的。

“公开透明”是公益组织的“魂”

公益组织更要说实话做实事，有些人说的很虚，所以到底做的怎么样那就是个问号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生态项目，现在可以落实到让大家查到每一棵梭梭在哪，“任小米”当然也是如此，你可以看得见东西，包括我们做的深圳红树林、云南蜂蜜等，都看得见在哪里，你可以任意去核实调查。

公益组织一定要公开透明，否则没有人会给你捐钱。不是说捐了钱的人才有权质问你，而是没捐钱的人也有权质问你，因为他明天可能会成为捐钱的人。他通过质问了以后，相信你了，他才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捐。

《慈善法》仍需完善，“九龙治水”不可取

目前《慈善法》中有一些规定与现实操作相矛盾，工作起来

很别扭。

法工委在立法的时候，请我们参加了两次，我们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。比如关于免税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概念，但是他们说“这个税法是另外一个法，不归我管。所以只能写上一句话：应该享受国家规定的免税政策。”这个免税政策是什么没有具体化，他要把它放到另外一个法里，我们的立法实际上涉及“九龙治水”的问题。

《慈善法》也是同样的，如果仅有一个立法而没有把所有部门综合起来进行立法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说在推出《慈善法》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把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调动起来，把税法改革的问题和《慈善法》连接在一起去做，那就是“九龙治水”结构——一人一段，那么在工商注册、民政管理等方面就会有很多相悖的地方，这个后遗症就很多了。

所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处于一个两难的情况。我们现在全国都有会员中心，希望通过会员中心来扎根当地，做一些环保工作，服务社会，可是按照程序上讲这是不合法的。根据《慈善法》，我们要在当地注册一个类似的公益组织，可选的有社会企业、NGO，还有一个是基金，你必须得在这三类里选择一类，否则我们就不合法。

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地方的会员中心争取都有一个当地的注册许可，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麻烦。否则我们作为协会来说，给当地付钱都有麻烦。给谁啊，怎么给啊？因为我们所有的财物要向捐赠者公开、对社会公开，那你这个落地项目是不是同样要有一个人接这个钱，发票谁开，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得到解决。

《慈善法》实施的同时，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还依然有效，其实它们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冲突的地方，没有很好地融合，这就让我们的NGO组织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很为难。